

论清末立宪派与清政府关系的嬗变

江 轶

(湖南工业大学 学生处,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立宪派作为清末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施曾起到过重大的推动作用,在预备立宪前期与清政府亦有过短暂的合作。但由于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最终归宿依然是维护皇权,其宪政的制度设计和操作模式与立宪派的方案始终存在分歧和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分歧也日益扩大,矛盾越来越激化,导致双方关系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嬗变过程:合作——对抗——背离,最后以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初期转向革命,同革命派一起推翻清政府而结束。

关键词:立宪派;清政府;嬗变

About the Chang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Construction Group

JIANG Yi

(Student Offic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rce, constitution construction group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ion which Qing government prepared to put forward in the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he group also had a brief cooperation with Qing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Qing Dynasty. But as the final goal of Qing government's constitution was to keep the imperial power, there always existed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operation model made by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design made by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group,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such differences expanded and contradictions intensified, caus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o undergo a strange process of change: co-operation-struggle-departure. Finall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Xinhai Revolution constitution construction group turned to revolution and together with the revolutionary group overthrew Qing government.

Keywords: Constitution construction group; Qing government; change

立宪派是清末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宗旨是试图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将中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由此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构成立宪派主体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比较著名的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郑孝胥、杨度、汤化龙、蒲殿俊等人。立宪派曾积极推动清政府立宪,但是其与清政府的关系却经历了一个合作——对抗——背离的嬗变过程。近年来,史学界日益注重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关系研究,意图通过该项研究获得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经验和教训,

这对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而晚清宪政改革期间立宪派与清政府关系的嬗变过程则成为两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 立宪派与清政府关系的嬗变过程

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关系嬗变过程经历了合作——对抗——背离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立宪活动其有各自的特点。

合作阶段:立宪派开始对清政府是有热切希望

收稿日期:2009-04-09

作者简介:江 轶(1980-),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

的,他们希望通过说服朝中权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温和的改革。清政府对立宪派的政治呼声也曾表示出积极的反应,两者有过短暂的良性合作互动时期。

立宪派早期活动的重点是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这些活动的主角是江浙立宪派人士。如1903年下半年张謇自日本考察回来后其君主立宪思想完全形成。1904年5月,他不断与两江总督魏光燾、湖广总督张之洞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为他们代拟立宪奏稿。江浙立宪派人士汤寿潜、赵凤昌等也参加了研究。后张謇又致书袁世凯,期望其上奏朝廷,表明立宪之意。张謇更注重对清廷中央权贵的立宪宣传工作。先后组织编辑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宪法史》等宣传立宪著作,“六月刻日本宪法成,以十二册由赵竹君凤昌寄赵小山庆款径达内廷。此书入览后,孝钦太后于召见枢臣时谕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1]可见清政府中枢在立宪派推动下已对立宪产生兴趣,而此后到了1905年8月,在全国八位总督中,有滇、粤、江、鄂、直五位奏请立宪。可见,立宪派的策动起到了积极效果,清政府尤其地方实力派官僚采取的是与立宪派合作的态度,为立宪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随后这种合作进一步深入,面对立宪大势,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上谕,立宪派大受鼓舞,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开展预备立宪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其中比较著名的团体有1906年12月在上海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以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由杨度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等,这些宪政团体通过出版书刊,开办宪政讲习所,普及宪政知识等宪政活动为清政府的立宪摇旗呐喊,成为清政府官方立宪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立宪派与清政府合作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对抗阶段:该阶段是立宪派与清政府就立宪制度设计、立宪手段及模式产生了重大分歧,由合作逐步转化为对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政院和谘议局内双方的争权,二是国会请愿上的斗争。

在资政院和谘议局上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使得对抗不可避免。立宪势必要召开国会,按照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步骤和方式,先成立资政院以为过渡。资政院虽然不是国会,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参政议政的场所。自1910年10月资政院开院以来,立宪派议员提出了一系列议案,这些议案涉及政治、经

济、法律、文教、社会风俗、地方事务等各方面,同时立宪派议员还敢于弹劾军机大臣、驳论上谕,表现出蓬勃向上的政治进取精神。在这些斗争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和请赦国事犯等。以速开国会案为例,早在1907年,立宪派就纷纷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其中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等上《请速设民选议院呈》云:“民选议院设立,则纲领既得,国家一切政务自有可以解决之道。”^[2]由于立宪派对朝廷宣布的九年预备立宪日期觉得过长,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民选议员提出速开国会议案。1910年10月22日,议员争相上台发言陈述速开国会理由:“国会一事为我国存亡问题”,“此案不决,诸案均不能决”。^[3]经过一番激烈辩论,资政院通过此项议案上奏,结果朝廷迫于压力,宣布开国会议的时间提早到宣统五年(1913年),但立宪派议员仍不满意,纷纷表示值此民族危难之机,应速开国会,不过最后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诺。这表明立宪派与清政府就立宪模式和步骤已经产生重大分歧,立宪派的提议未被清政府接受预示对抗已经出现。而谘议局作为省级的参政议政机构,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对抗本不严重。但由于谘议局议员大多本为当地的实力派人物,是立宪派的中坚力量。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就开展地方自治、发展教育、减轻民众负担、兴修水利、改良社会风俗方面等作了很多工作。同时在谘议局内竭力维护自身权益,同督抚的侵权行为进行斗争。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湖南、浙江、江西、广东、江苏等省。在这些维权斗争中,立宪派表现了他们坚决维护自身权益的决心,虽然有些失败了,但相当一部分却达到了目的,使督抚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不得不考虑谘议局的制约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立宪派在谘议局内的作用,同时也表明在地方上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对抗开始产生。

真正使得对抗加剧的是国会请愿运动。由立宪派发动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尽管把立宪运动推向高潮,但清政府的态度迫使立宪派人士不满日益加剧,甚至在两者激烈对抗之时,部分立宪派人士开始密谋转向革命。

由于不满清政府宣布的九年预备立宪,立宪派希望缩短年限,速开国会,于是自1910年起以谘议局为核心,由立宪派领导、全国规模的请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先后进行了四次。但清政府始终坚持以宣统五年召开国会为最后底线。在第四次国会请愿中,清政府以专制手段弹压了立宪派的要求,结果各代表团“即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

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4]经过这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立宪派和清政府政治立场和诉求相距越来越远,使立宪派中某些激进人士对清政府失去了最后的耐心,从而为当辛亥革命发生时立宪派转向革命埋下了伏笔。

背离阶段: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国会请愿运动失败的继续。在1911年5月的责任内阁人员任命问题上,在13位阁员中,满人有9名(其中皇族竟有7人),而汉人只有4名。这使得本来有近代意义的新内阁失去了其制度功能,变成了典型的“皇族内阁”。这种以组阁之名行集权之实的手法引起许多立宪派议员甚至包括一些汉族督抚的不满,他们集体上书表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之唯一原则,世界各国苟号称立宪,即无一不求此与原则相吻合”、“今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5]^[57]然而清政府坚持皇族内阁,在偏离真正宪政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立宪派的政治要求不仅未能得到满足,反而越来越毫无希望,立宪派由失望变得绝望。此时革命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派的最终政治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毕竟也属于立宪政体,这点与立宪派的政治目标本质上是趋同的,于是两派就有了合作的政治基础。立宪派苦等清政府主动实施君主立宪未果,而清政府在非常之时的政策失误使立宪派对清政府已经完全失望。辛亥革命一起,相当一部分立宪派人士便转向革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 立宪派与清政府关系嬗变的原因

立宪派与清政府关系发生嬗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归根结底就是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均匀导致立宪派对清政府的不满。清政府想继续垄断政治资源,独享权利,而立宪派则力图占有更多政治资源,“力求进入体制,以群策群力来解决民族危机并影响和参与现代化决策”,^[6]^[40]从而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在立宪开始阶段这种矛盾不明显,到了立宪的中后期矛盾激化,使得合作转化为对抗直至两者的背离。具体矛盾体现为立宪层次的高下和“预备立宪”的期限两个问题。

就立宪层次而言,清政府决定选择日本的二元君主立宪政体,而不是英国的虚君制君主立宪政体。这其实是不言自明的,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矛盾心理的艰难抉择:立宪是为了维护皇权,但同时又破坏了专制皇权,为了解决矛盾,就需要有一种立宪方案既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皇权和专

制统治,又能满足立宪派的政治要求。而最好的折衷方案就是采用日本的二元君主立宪模式,国家虽有宪法,其真正的权力中心仍然是君主,其权力只受到宪法和议会的较小限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了二元君主制,根据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除掌握行政、军事权力外,还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并控制着立法权,权力极大。且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采用日本政体王室对清来说最为适宜。这也是清政府立宪的最后底线,立宪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如果采用立宪派所追求的虚君制君主立宪政体,皇权被虚化,这是清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于是在立宪的过程中,清政府以建立二元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改革和立宪派要求建立虚君立宪体制的目标原本就道不同,不相谋;同时在权利分配上,清政府的政治改革宗旨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力图用集权手段挽回已经失去的中央权威,使得立宪派原本力图进入政治决策层面的种种努力大受限制。尽管立宪派的政治诉求较专制时期得到了较大的满足,但清政府由于不断集权而产生的信誉危机使得立宪派失去了对清政府的政治信任感,最终不得不走上与清政府分道扬镳的道路。

在立宪的时间准备上,清政府一开始就宣布立宪需要有一定时间准备。一般来讲,政治改革中旧的体制影响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于新的体制之中,改革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转化、调整、适应的过程,这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是正确的。日本于1881年开始筹备立宪,明治天皇颁布敕谕,宣布9年内开设国会,可直到1898年才颁布宪法。在清政府内部普遍认为预备立宪要相延一定时间,如端方主张15-20年颁布宪法、召开国会,载泽则主张以20年为预备立宪之期。^[7]而另一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也表示:“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20年为实行宪法之期”。^[8]所以,在中国这种封建专制历史悠久的社会里,清政府立宪要预备的政策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清政府曾明确表示立宪:“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5]^[43]在《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谕》里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期限为9年,这已经是以前比较快的速度在实施宪政的步伐了。但由于受当时的国家危亡处境造成的急功近利思想影响,立宪派对此仍有不满,很快作为立宪象征的召开国会问题成为清政府与立宪派争论的焦点。

有关成立国会的日期,本来清政府是依照日本的做法,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以9年为期,至光绪四十二年(1916年),完成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及颁布议院法等一列工作以后,随即发布召开议院诏,成立国会。按正常的宪政实施程序,9年后召开国会应可以接受。但受地方谘议局强烈要求召开国会的影响,到了资政院成立的时候,“速开国会案”成了首先讨论并获得通过的最重要的议案。然而清政府在设立国会的问题上始终坚持9年预备立宪,有关召开国会等问题,必须到1916年待一切立宪措施预备好以后才能进行。在《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中,就清楚表明了清政府的态度:“严饬内外臣工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体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等谕”。^{[5]69}但随着在1909年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死去,清廷仅有的政治权威不复存在,只有软弱的隆裕太后和无甚政治经验的摄政王载沣扶持着岌岌可危的政局。清政府在朝野压力下不得已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发布《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谕旨》:“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两年所能成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5]78}不过此次缩减日期仍未使立宪派满意,在资政院内民选议员提出为何将国会延迟至1913年,使立宪派和地方督抚对清政府的拖延政策大为不满。而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本身就违反宪政原则,清政府的这些借立宪名义收权中央的做法使得立宪派人士大为寒心,也加剧了支持立宪的汉族督抚的离心倾向。而在第四次国会请愿活动中,面对清政府已经允诺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的情况,立宪派尤其是东三省的立宪派人士又反复请愿坚持要速开国会,而清政府表示绝不再让步,强行解散请愿代表团,甚至将温世霖等立宪派人士遣成新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政治方案不作让步,矛盾越来越激化,少理性而多冲动的情绪已经蔓延到双方,双方的政治互信度急剧下降,最后的交恶已经无法避免,最终导致立宪派和清政府完全背离,反而在辛亥革命初期和革命派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

在清末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中,立宪派和清政府

本意都是想通过温和的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是两者的动机却不相同,清政府实行立宪是想继续保持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立宪派推动立宪是想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使自身获得相应的政治经济权益。然而在以臣属型政治文化为主体,被封建专制制度浸淫了数千年的中国进行改革,意图把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变革为对君主权力有所限制的君主立宪制度,其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其付出的改革成本必然是很大的。此外,由于晚清宪政改革具有民族自救的动因,危如累卵的时局加重了人们急功近利的思想,使本来推行的渐进改革战略变得越来越激进,结果清政府失去了改革的主导权和对社会局势的控制能力。“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9]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本应成为同盟关系的立宪派和清政府的关系却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嬗变过程:合作—对抗—背离,最后转向革命,种种美好的制度设计悲哀地成为历史的祭品,不得不令人掩卷深思。

参考文献:

- [1] 张謇. 张謇全集:第六卷[M]. 曹从坡,杨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866
- [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9:611.
- [3] 阎小波. 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00
- [4] 李新.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21.
- [5] 沈云龙.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M]. 台北:文海出版社.
- [6] 关海庭. 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0.
- [7] 胡绳武,金冲及. 论清末的立宪运动[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26
- [8] 梁启超. 立宪法议[M]//饮冰室合集·文集:卷20. 上海:中华书局,1936:47.
- [9] [法]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210-222

责任编辑:骆晓会